

## 宮崎市定與雍正硃批諭旨研究班\*

伍 躍\*\*

本文回顧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中以「雍正」為核心的學術軌跡，重點介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導的「雍正硃批諭旨研究班」的創立與發展。研究班自 1949 至 1971 年持續二十餘年，由安部健夫（1903-1959）、宮崎市定（1901-1995）、小野川秀美（1909-1980）等學者主持，先後吸引近百人參與。該研究班系統研讀《硃批諭旨》，並圍繞奏摺政治、朋黨問題、財政制度、思想統制等展開研究。研究成果陸續發表於《東洋史研究》專號，後彙編為《雍正時代の研究》。這一長期集體研讀活動在學界極為罕見，對清代制度與政治史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該研究班不僅揭示了硃批諭旨的史料價值，更展示其在皇帝專制政治運作中的作用。雍正帝在位（1722-1735）十三年推行多項改革，整飭吏治、強化中央集權，但改革的持續性終受個人精力和制度侷限所制約。總體而言，宮崎市定和該研究班的努力奠定了雍正研究的重要基礎，並體現了戰後日本學界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探索。

關鍵詞：雍正皇帝、硃批諭旨、宮崎市定、奏摺制度、專制政治

---

\* 本文的構思與執筆均獲邱澎生教授的建議鼓勵，寫作期間承多位師友教示指正，又蒙匿名審查者點撥批評。僅此誌諸簡端，用示不忘。

\*\* 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國際學部教授

## 前言

在回顧日本戰後的中國史研究，以及該研究對國際學界的影響的過程中，「雍正」是無法迴避的關鍵詞之一。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為中心的「雍正硃批諭旨研究班」（別名：清代奏疏中の社会經濟資料の集成）的存在及其活動，而談到這個研究班以及對雍正時代的研究，就離不開積極籌組並始終積極引導這一研究班的已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宮崎市定（1901-1995）。隨著物換星移，時光變換，雍正硃批諭旨研究班本身也已經成為歷史。考慮到回顧這一歷史，會有助於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把握學術本身發展進化的脈絡，故本文將概述該研究班創立前後的活動情況，並以奏摺制度為中心介紹相關研究。<sup>1</sup>

### 一

該研究班的活動始於 1949 年度，至 1971 年度中止，活動時間長達 22 年，歷經安部健夫（1903-1959）、宮崎市定、小野川秀美（1909-1980）三代班長。<sup>2</sup>該研究班結束之後，佐伯富（1910-2006）教授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專攻的演習課程<sup>3</sup>中繼續以《雍正硃批諭旨》作為基礎文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小野和子（1932-）教授利用她主持的「明清時代的政治與社會」在 1983 年最終完成該研究班創立時的願景——編制雍正硃批諭旨索引語彙。先後參加該研究班和摘抄索引卡片的學者將近百人（參見附圖 1），摘錄的卡片達 12 萬張。得知索引編制告成的消

1 另請參看伍躍，〈日本的雍正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7（北京），頁 26-30。

2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所 50 年》（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9），頁 79、178。

3 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專業的課程設置中，演習課的宗旨是訓練學生的文獻閱讀能力。

息，宮崎市定寫下了〈人文科學研究所雍正硃批諭旨索引緣起〉稱：

該項事業自創始以來，有弛有張，歷經三十有五載。昔之青壯，今已鬢髮斑白，或屆還曆，或近古稀，余亦頽然老矣。得聞告竣之報，倍感欣快。憶往昔之事，述其緣起，庶幾傳至後世焉。<sup>4</sup>

由此可見，在雍正硃批諭旨研究班的活動中止之後，圍繞著《雍正硃批諭旨》的教學研究還持續了大約十年以上。如果從開班時的 1949 年起算，該研究班及其後續的相關活動持續了 30 多年。恕筆者寡聞，類似這種以一個具體文獻為閱讀對象組織讀書班，歷經幾代學者薪火相傳，長期堅持不懈的研究活動在學界恐怕是不多的。

該研究班的創立與宮崎市定對清代史的研究興趣密切相關。根據宮崎市定本人的說明，他在京都大學求學期間曾經在矢野仁一(1872-1970)門下學習過清朝史和自尼布楚條約至近代的中國對外關係史，但此後大約十多年未曾接觸過清朝史的問題。戰爭期間，宮崎市定所屬的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承擔了日本政府的國策研究機構——東亞研究所(1938.9.1 設立，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1891-1945〕兼任總裁)的「委託研究」，他被分配負責與清朝史有關的研究，先後從事的課題有「清朝官制と官吏登用法」、「清朝の支那統治策」、「中国の辺境統治策」和「英仏連合軍の北京占領事件」等。圍繞這些課題，宮崎市定在戰爭期間公開的研究成果有〈支那側史料より見たる英仏聯合軍の北京侵入事件——特に主戰論と平和論〉<sup>5</sup>、《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第二篇第一章之清代官制，<sup>6</sup>戰後公開的研究成果有〈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sup>7</sup>和《科擧》<sup>8</sup>等。

- 
- 4 宮崎市定，〈人文科學研究所雍正硃批諭旨索引緣起〉，收於東洋史研究會編，《雍正時代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頁 833-834。
  - 5 《東亞研究所報》24(東京，1943)，頁 40-72。現收於佐伯富、島田虔次、岩見宏、礪波護編，《宮崎市定全集》(第 1-24 卷、別卷，東京，岩波書店，1991-1994)第 16 卷，頁 117-147。
  - 6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頁 171-179。《宮崎市定全集》及該全集第 24 卷之〈著作年表〉中均未見收錄。
  - 7 《東方史論叢》1(丹波市町，1947)，頁 1-56。現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282-337。
  - 8 該書由秋田屋(東京)初刊於 1946 年，後於 1987 年改訂後更名為《科擧史》，收於東洋文庫(東京，平凡社，1987)，與《科擧——中国の試験地獄——》(東

在從事這些研究的過程中，接受了嚴格的歷史學研究訓練、以研究中國制度史為己任的宮崎市定發現，包括名著《清國行政法》在內，許多研究清朝歷史的著作均有隔靴搔癢之感，很多具體問題有待深入研究，但遺憾的是清代史的研究缺少相當於歷朝歷代「正史」的基本文獻。同時，他沒有忘記恩師桑原隲藏（1871-1931）的教誨，即根據研究目的可以通讀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結束後不久，宮崎市定開始通讀清代的編年體史書——王先謙（1842-1918）撰《十一朝東華錄》。<sup>9</sup>

通讀從天命朝（1616-1626）開始，經過天聰（1627-1636）、崇德（1636-1643）、順治（1644-1661）和康熙（1662-1722）各朝，當進入雍正朝（1723-1735）之後，宮崎市定敏銳地感覺到對雍正帝的人物形象有了相對完整的認識，遂決意深入研究。恰在此時，他邂逅了《雍正硃批諭旨》。他在〈雍正硃批諭旨解題〉中不惜讚詞，寫下了讀後的感想，「雍正皇帝的硃批明晰無比，是讀後令人心曠神怡的文章。不妨稱為天下第一痛快之書」！<sup>10</sup>關於這一過程，晚年的宮崎市定在《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的〈自跋〉中的一段大約500字的文章中連用4個「有趣、有意思」（日文「面白い」），由此可以透見一個學者從文獻中得到的刺激和隨之而來的興奮，以及該書在他研究生涯中的分量。茲將該部分文字略譯如下：

從開始的部分著手閱讀《東華錄》，經過康熙朝，到達雍正朝之後，在閱讀的過程中覺得非常有意思。之所以說它有意思，並非文章在文筆上有魅人之處，而是文章的內容、記載的事實本身有意思。造成這些歷史事實的中心人物無疑就是雍正帝自身。在此之前的腦海中，創立軍機處的雍正帝，向西藏派兵將其置於保護之下的雍正帝等，都是一個個彼此相對孤立的存在。通過閱讀，焦點漸次重合，逐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雍正帝的人物形象。我在

京，中央公論社，1963、1984）不同。兩書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15卷，頁1-252、255-444。

9 《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自跋〉，頁401-402。

10 原載《東洋史研究》15：4（京都，1957），頁1-32。現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頁137-172。

讀完《東華錄》的雍正朝之後，決定詳細研究雍正帝，故暫時中斷了通讀。在收集資料時，發現了史學科陳列館書庫的一角有一部卷帙很多的《雍正硃批諭旨》。通常對該書的利用多限於其中的一部分，我決意通讀這部書。幸好與當初的預想不同，這部書不是令人沉悶的資料堆砌，而是非常有意思的。《東華錄》中有不少是被一筆輕輕帶過的部分，在這部書中卻有很多給人一種向著深部一層又一層地切入、直至骨髓的、令讀者欲罷不能的描寫。<sup>11</sup>

《雍正硃批諭旨》是雍正帝在日理萬機之際，於雍正十年（1732）開始親手選定編輯的一部公文書集成，日後被收入《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還有不少官私刊本。決意通讀且實際上通讀了該書的學者恐怕為數不多。宮崎市定在閱讀的過程中作了詳細的筆記，用了大約四年的時間，通讀了這部收錄了 232 名地方官奏摺的巨著。

大約在 1949 年，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吉川幸次郎（1904-1980）提議為「岩波新書」撰寫一套中國歷史叢書，計劃收錄《漢武帝》（吉川幸次郎）、《史記》（貝塚茂樹，1904-1987）、《水經注》（森鹿三，1906-1980）和《王陽明》（島田虔次，1917-2000）等等。當時，眾人以為宮崎市定會撰寫《王安石》，沒有想到他最終挑選的人物是「雍正帝」。<sup>12</sup>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學界和讀書界，有不少人不知道雍正帝的「雍」字應該如何發音，甚至有人認為「雍正」是明代的年號，足見雍正帝在當時的日本幾乎無人知曉。<sup>13</sup>宮崎市定為了撰寫該書，在 1948 和 1949 年的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專業的特殊講義中連續講授了「雍正帝と其の時代」。<sup>14</sup>晚年的宮崎市定回顧自己當時的決定時又是「有意思」的連發：

11 《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自跋〉，頁 402。

12 宮崎市定，《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東京，岩波書店，1950）；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3-133。

13 其實在中文學界，情況也大同小異。2003 年，楊啟樵（1931-2019）在《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第三版自序中稱：「三十餘載前，我著手撰寫雍正之時，同道者寥若晨星。雍正何許人也，鮮為人知」。見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自序〉，頁 1-2。

14 井上文則，《天を相手にする——評伝 宮崎市定》（東京，國書刊行會，2018），頁 273-277。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專業的課程設置中，特殊講義屬於研究型課

我逐漸下定決心寫雍正帝。在這種場合，必須要寫出雍正帝，直至讓每一個人熟知雍正帝為止，考慮到「新書」的大眾性，有必要讓讀者覺得有意思。作者覺得有意思的題目，一定要在覺得有意思的期間內寫出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讀者就不可能覺得有意思。<sup>15</sup>

日後，有非東洋史專業的讀者見到宮崎市定時說：「那本書非常有意思」。宮崎市定認為，這是對該書最高的讚詞。

應該說明的是，宮崎市定之所以覺得「有意思」的最主要原因：他是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來閱讀《十一朝東華錄》，進而通讀《雍正硃批諭旨》的。這個「強烈的問題意識」就是長期以來對皇帝問題的思考。他認為，所謂的皇帝問題實質上就是皇帝在國家制度中的定位問題，即究竟應該將皇帝置於制度之內，還是置於制度之外的問題。就當時學界的一般常識而言，通常將獨裁君主和絕對王朝的統治者視作不受任何制度制約和束縛之人。但是，基於中國傳統習俗考慮的話，作為獨裁者的皇帝應該也和常人一樣，要服從於社會道德。換句話說，皇帝要受到祖法的約束。但是這種約束力卻並非絕對不變之物，憑藉一己之力的皇帝變更祖法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所有這些，在日本研究清代制度史的必讀書——《清國行政法》中雖然羅列了皇帝的諸多特權，但僅僅是就法制規定而言，<sup>16</sup>無法令讀者對皇帝這一事物本身產生感性的認知。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問題意識，所以宮崎市定面對大臣的上奏和雍正帝時而嬉笑怒罵、時而推心置腹的硃批諭旨時才感到「非常有意思」。此外，他通過與中國史上其他的統治者相比，認為找不到第二個類似雍正帝的統治者。因此，宮崎市定認識到，為了理解歷史上出現的雍正帝，已經不能採用《清國行政法》的分析框架——法律制度，必須採用史學的方

---

程，此種課程並無一定的結論性內容，教員通常在課上講述當下正在研究中的題目。

15 《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自跋〉，頁403。

1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清國行政法》第一卷汎論（上、下卷，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4）在第二編「行政組織」中立有〈皇室〉一章，依次敘述了皇帝、皇位繼承、立皇后、太上皇及皇太后、訓政·輔政·攝政及議政、皇族、皇室所屬之官廳、皇室財產，見頁68-141。中文版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清國行政法汎論》（東京，金港堂書籍，1909），頁152-264。

法。

《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是一部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讀物，對徵引史料的處理與通常的學術論文有所不同。<sup>17</sup>該書問世時，宮崎市定在學界的影響遠遠不如日後，據說該書當初的銷售情況也不盡如人意。<sup>18</sup>但宮崎市定始終抱定上述的問題意識，不僅自己閱讀，並決定在學界聯絡同志，推進對雍正時代的研究。

在宮崎市定通讀《雍正硃批諭旨》之前，長期從事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安部健夫已經通讀過該書。他們兩個人協商之後，決定從 1949 年起依托剛剛組建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sup>19</sup>舉辦研究班，召集志同道合者一起重讀該書。宮崎市定和安部健夫決定利用通讀《雍正硃批諭旨》，將史料分門別類地編制卡片，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最終為學界提供一幅雍正時代的剖面圖。安部健夫為此起草了〈硃批諭旨索引語彙採擇基準〉，以後發展為〈清雍正朝史研究計劃表〉。據宮崎市定晚年回憶，當時有些人不理解為什麼這樣只讀一種文獻，認為長此以往，會導致學問的萎縮。對於這種意見，安部健夫針鋒相對地表示反對，斬釘截鐵般地訓誡道：「只有這樣，才是學問」。<sup>20</sup>宮崎市定本人也表示過哪怕只有自己一個人也要堅持下去。<sup>21</sup>該研究班經過多年的不懈堅持，終於在 1956 年以「雍正時代史の研究」為題，成功地申請到了日本文部省的資助。

雍正硃批諭旨研究班在會讀文獻的同時，還對雍正時代進行了研究。宮崎市定曾說，班員中有人以硃批諭旨為主要史料，有人從硃批諭旨出發尋找其他史料，各自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撰寫論文。<sup>22</sup>在此基礎

17 宮崎市定著，孫曉瑩譯，《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16，譯者註。又，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閱了孫曉瑩譯本，謹致謝忱。

18 井上文則，《天を相手にする——評伝 宮崎市定》，頁 273-277。

19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所 50 年》，頁 76-79；京都大學百二十五年史編集委員會，《京都大學百二十五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23），頁 226。

20 《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自跋〉，頁 406。

21 佐伯富，〈はしがき——雍正硃批諭旨研究班の思い出——〉，收於東洋史研究會編，《雍正時代の研究》，頁 i-iii。

22 宮崎市定，〈雍正時代の研究 解説〉，收於東洋史研究會編，《雍正時代の研究》，頁 830。

上，1957年3月の《東洋史研究》第15卷第4號以「雍正時代史研究」專號的形式刊發了下述5篇文章：

- 宮崎市定〈雍正硃批諭旨解題——その史料的价值——〉
- 佐伯富〈明清時代の民壯について〉
- 岩見宏（1924-）〈雍正時代における公費問題の一考察〉
- 荒木敏一（1932-）〈雍正二年の罷考事件と田文鏡〉
- 安部健夫〈米穀需給の研究——『雍正史』の一章としてみた——〉

此後，《東洋史研究》又三次編發「雍正時代史研究」的專號，大致情況如下：

《東洋史研究》第16卷第4號（1958.3）收錄論文：

- 宮崎市定〈清朝の胥吏と幕友——特とく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
- 佐伯富〈康熙雍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清貿易〉
- 荒木敏一〈直省教學の制を通じて觀たる雍正治下の文教政策——清初の學官教職の一考察——〉
- 小野川秀美〈雍正帝と大義覺述録〉
- 安部健夫〈耗羨提解の研究——『雍正史』の一章としてみた——〉

《東洋史研究》第18卷第3號（1959.12）收錄論文：

- 宮崎市定〈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實狀——硃批諭旨と鹿洲公案——〉
- 荒木敏一〈雍正時代における學臣制の改革——主として其の任用法を中心として——〉
- 塚本俊孝〈雍正帝の儒佛道三教一體觀〉
- 岩見宏〈雍正年間の民欠について〉
- 狩野直楨（1929-2017）〈狝家苗の平定をめぐって〉
- 小野和子〈清初の思想統制をめぐって〉
- 寺田隆信（1931-2014）〈雍正帝の賤民開放令について〉
- 佐伯富〈清代雍正朝における通貨問題〉

《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3號（1963.12）收錄論文：

宮崎市定〈雍正帝による俸工銀扣捐の停止について〉

佐伯富〈清代における奏銷制度〉

荒木敏一〈雍正治下に於ける考差法の成立〉

狩野直楨〈茶馬貿易の終末——雍正時代の茶法の實態をめぐって——〉

横山裕男〈觀風整俗使考〉

岩見宏〈養廉銀制度の創設について〉

這些論文的研究對象幾乎都是雍正年間比較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如涉及權力運用方式的奏摺政治，涉及國家財政和官僚收入的耗羨提解、奏銷制度和養廉銀的問題，涉及到大義覺迷錄、思想統治和觀風整俗使的問題，以及涉及到地方統治實態和解放賤民等問題。這些研究充滿了新鮮感，對海外學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湧現了一批後續研究。其中，僅被宮崎市定日後提到的就有黃培、莊吉發、陳捷先（1932-2019）、白彬菊（Beatrice C. Bartlett, 1928-2024），以及參加過研究班的活動、撰寫了《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的楊啟樵等人的研究。為了因應學界對上述四期專號的需求，東洋史研究會於1986年將上述各專號的24篇論文合編為論文集《雍正時代の研究》，附錄有安部健夫撰〈清雍正朝史研究計劃表（硃批諭旨索引語彙採擇基準）〉、雍正硃批諭旨上疏者名索引，並且附上了十分詳細的索引。<sup>23</sup>

在研究班通讀《雍正硃批諭旨》的同時，宮崎市定開始關注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統治問題。因為雍正帝選擇收錄的主要是以督撫藩臬等負責一省或數省的高級官員的奏摺，僅有兩三篇知府的奏摺。在這種情況下，利用《雍正硃批諭旨》固然可以了解國家政策的形成過程，但難以用來研究該項政策在基層社會的實施以及獨裁君主統治下的基層社會的實際狀態。尤其是雍正帝傾注了大量精力的奏摺政治之首要目的是整頓官僚綱紀，但皇帝無論如何不可能直接監督整頓到每一個直接臨民的州縣官員的綱紀，只能是間接地通過督撫藩臬管理州縣官員。因此，皇帝的旨意能否大致無誤地直接貫徹到基層的問題對於研究這一時期制度史、政

23 《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自跋〉，頁409-411；宮崎市定，〈雍正時代の研究 解説〉，頁830-832。

治史、社會史來說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宮崎市定在通讀《雍正硃批諭旨》的過程中，越讀越覺得有必要探究雍正帝的政治理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的問題，於是開始尋找新的史料。也正是在此時，他從藍鼎元（1680-1733）的《鹿洲全集》中發現了「文章內容十分新鮮、作為讀物非常有意思的」《鹿洲公案》一書。該書是藍鼎元在雍正年間歷任普寧縣和潮陽縣知縣時的處理公務的回憶錄。根據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專攻第一位女生——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小野和子的回憶，她大學本科三年級時（1952）履修宮崎市定的演習課，當時使用的教材就是《鹿洲公案》<sup>24</sup>。在此基礎上，宮崎市定於1959年發表了前述〈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實狀——硃批諭旨と鹿洲公案——〉。<sup>25</sup>以後，他又經過多年努力，在退休後將《鹿洲公案》全文譯成日語，出版了《鹿洲公案——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記録》。<sup>26</sup>在該書的解題中，宮崎市定稱：「我認為本書是記錄舊中國社會實際狀態的最有意思的書籍。」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雍正時代研究的「緣起」根植於這一研究領軍人物——宮崎市定（案：當然還有初代班長安部健夫）自身抱有的強烈的問題意識，但他並不是急就章式地收集材料忙著撰寫論文，而是在系統地閱讀文獻的過程中不斷思考，以致於到了欲罷不能的境地，乃至最終決定放棄原有閱讀計劃，將幾乎全部的研究精力投入到相關研究之中，並組織團隊進行共同研究。可以說，正是這種源自問題意識的動力驅使宮崎市定組織並引領了關於雍正時代的研究。

---

24 《宮崎市定全集》別卷，月報，頁4-7。

25 宮崎市定，〈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實狀——硃批諭旨と鹿洲公案〉，《東洋史研究》18：3（京都，1959），頁241-266。現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頁206-235。

26 清·藍鼎元著，宮崎市定譯，《鹿洲公案——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記録》（東京，平凡社，1967），該書後收於《宮崎市定全集》別卷，頁3-240。

## 二

晚年的宮崎市定在談到撰寫雍正帝傳記的起點時曾經說到：

研究中國近世史的時候，即可以從宋代逐漸向下，也可以從清代開始回溯。我想給清朝史學習者的忠告是，從雍正時代開始切入是便利的路徑。我撰寫《雍正帝》的出發點就在於此……。<sup>27</sup>

「雍正硃批論旨研究班」共同發起人宮崎市定和安部健夫當初計劃通過研究，為學界提供一幅雍正時代的剖面圖。我們通過安部健夫撰寫的「清雍正朝史研究計劃表」可以窺見這一未竟事業的藍圖。該計劃分為九篇，即政治、官僚、胥役、財政、土木、經濟、社會、思想和人物，以及分散於各篇之中的兩篇，即軍政與軍事。各篇分別開列研究課題，少者三、四個，多者達到二十個。在課題之下還有備考。（參表 1）

表 1 清雍正朝史研究計劃表·社會篇

課題		備考
1	社會勢力的諸相	構成
2	下層社會的生態	
3	特殊社會的生態	
4	秘密社會的生態	
5	滿漢兵丁的生活	
6	社會惡的諸相	問題
7	社會性緊張的諸相	
8	旗人與民人的關係	
9	災害對策與救濟設施	政策
10	社會教化的實際狀態	
11	陸路營汛的警察機能	警察
12	水師營汛的警察機能	
13	府州縣及其警察機能	
14	民間的警察機能	
15	裁判制度與刑罰	(司法)
16	里甲制度與保甲制	(自治)

資料來源：《雍正時代の研究》，附錄，頁839-840。

27 《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自跋〉，頁 411。

我們透過收錄在《雍正時代の研究》一書中的由該研究班成員撰寫的 24 篇論文也可以看出，雖然沒有一部完整的雍正朝史，但旨在提供「一幅雍正時代的剖面圖」的計劃確實在一步步地推進。如果從清代制度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角度看，該研究班留下的最大的成果無疑就是在揭示雍正硃批論旨本身具有的史料文獻價值的基礎上，論證了該硃批論旨在以皇帝為頂點的中國近世專制政治制度運轉中所發揮的作用。<sup>28</sup>

自清末以來，對清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始終得到學界的關注，雍正皇帝的即位、設立軍機處、秘密建儲、整飭吏治、改土歸流等都是比較熱門的話題。關於雍正朝的硃批論旨也曾經有過論述。如劉法曾在《清史纂要》第 3 章「極盛時期」之第 7 節「雍正之英察」中述及，「於內外大臣之奏疏，往往密行細字，手自批答，大要歸於戢權勢，散朋黨，戒欺飾。……殆達君主專制之極點已」<sup>29</sup>。1923 年，蕭一山（1902-1978）撰就了《清代通史》上卷，在該書第六篇「康雍時代之武功及政教」的第二十九章「雍正之內治」中專列「胤禛之性格」一節，提及「胤禛精嚴綜覈，手定大政，慮本章轉奏，或有洩漏遲滯之弊，乃改令機密用摺奏，皆可直達御前。胤禛親加批閱，或秉燭至午夜，所批動輒萬言，洞澈竅要，萬里之外，宛若覲面」。<sup>30</sup>由於撰著者的側重互有不同，這些著作雖然提到雍正帝親自批答來自臣下的上奏，也提到了雍正帝此舉的目的所在，但對該項制度及其與其他歷史現象之間的關係均未作太多陳述。加之當時對清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政治、財政等領域，對於涉及文書行政、尤其是文書行政與國家統治的關係等相關問題尚無太多的關注。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劉法曾和蕭一山等的研究屬於開風氣之先，那麼源自雍正硃批論旨研究班和宮崎市定本人的關於硃批論旨問題的研

28 關於傳統中國專制政治制度的問題，建議參看以下論考：甘懷真，〈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收於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533-546；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4（北京），頁 4-28。關於專制理論的登場及其在歷史上的演變，可參閱陳正國，〈從專制到東方專制——十八世紀英國殖民進程與東方專制論的源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4（臺北，2017），頁 917-995。

29 劉法曾，《清史纂要》（上海，中華書局，1914），頁 54-57。

30 蕭一山，《清代通史》冊 1（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頁 887。

究，便具體詳實地分析了奏摺政治產生的背景、運用實態以及周邊的相關問題。

晚年的宮崎市定對選定《雍正硃批諭旨》和雍正時代作為那一時期的研究對象有過比較詳細的說明。他在〈雍正時代の研究 解説〉中，舉出為研究《雍正硃批諭旨》和《元典章》付出了畢生精力、英年早逝的安部健夫的事例，說明《雍正硃批諭旨》是一部具有極高的價值，以致於學者願意為其貢獻自己生命的文獻集。他認為，由於清代的文獻資料沒有經過史學家的消化整理，故尚未達到一個相對容易利用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清代的歷史還沒有被充分地體系化。其標誌就是，當時尚不存在清代的「正史」。在這種情況下研究清代的歷史，勢必從根本資料，即官文書和檔案入手。但就當時的資料環境來說，利用檔案幾乎是不可能，利用源自檔案的官書也並非輕而易舉，故只能從後者中選取適當的文獻，在這種認識之下，最終選定了《雍正硃批諭旨》。<sup>31</sup>

宮崎市定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除了前述的背景之外，還有一個具體的動機——雍正帝對朋黨問題的警戒。這一動機既是政治史的，也是制度史的。在宮崎市定的認識中，雍正帝意識中的朋黨問題絕不僅僅源自他目睹熟知的父皇康熙帝晚年以來「分別門戶，彼此傾陷，分為兩三黨，各有私人」的現象，<sup>32</sup>而且涉及到皇帝專制制度本身在運行過程中的問題。宮崎市定認為，中國近世專制制度的理念形成於宋代，但在該制度下成為特權階級的官僚往往會制約和阻礙皇帝行使專制權力，造成制度的理念與制度的現實出現脫節的情況。而這種特權階級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其首要是因為皇帝在實施專制統治時需要官僚的存在，而官僚們為了利用皇帝的需要以求私利，往往結成朋黨。就專制制度的理念而言，能夠享受眾人之上的特權者僅有皇帝一人，官僚的地位出自皇帝的一時之恩，官僚直屬於皇帝，只能作為專制統治的馴服工具，不應有私利可言。如果官僚們為了追求利益結黨營私，勢必會危及以皇帝為頂點的專制制度。因為在以一人治天下的政治體制下，被治者不滿的矛頭最終必

31 宮崎市定，〈雍正時代の研究 解説〉，頁 830。

32 清·鄂爾泰等，《清世宗實錄》卷 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收於《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冊 7，頁 355-359。按：以下所引歷朝《清實錄》，皆用此版本，不再贅述。

然會指向統治者——皇帝，甚至造成王朝覆滅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宮崎市定認為，宋代以後中國近世的歷史也是獨裁君主和官僚之間持續不斷的暗鬥的歷史，雍正帝的所作所為，就是源自他在「冷宮中喫冷飯的四十五年間」對歷史和制度，以及政治鬥爭現實的深邃理解。

眾所週知，雍正帝對朋黨深惡痛絕，在即位後的第二年專門撰寫了〈御製朋黨論〉，指斥歐陽修（1007-1072）〈朋黨論〉中「君子以同道為朋」的論斷屬於「異說」，受其扇惑，一些人「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並稱「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雍正帝明確主張「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要求「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為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sup>33</sup>當然，雍正帝深知，僅僅有文字上的宣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義當惟知有君」的理念制度化。硃批諭旨就誕生在這背景之下。

宮崎市定或者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沒有過多地追尋硃批諭旨的制度淵源，但從今日來看，始自康熙年間的密摺制度應該是其源流之一。<sup>34</sup>密摺不僅可以直達御前，讓皇帝盡快得知軍國大事，而且還兼收箝制官僚之效。康熙帝曾說「令大臣皆奏密摺」可以「明目達聰」，即「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無不洞悉，凡一切奏摺，皆朕親批，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摺，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懼修省矣」。<sup>35</sup>相信雍正帝不僅熟知父皇的上述諭旨，也極有可能在宮中看到過當年曹寅（1658-1712）、李煦（1655-1729）和王鴻緒（1645-1723）等人呈上的密摺。在此基礎上，雍正帝為了確立皇帝專制制度，根絕官僚之中的朋黨之風，從制度上實現官僚個人對皇帝的縱向從屬，決定推廣實施奏摺制度。

雍正帝決定將奏摺的使用範圍從總督、巡撫和若干特許之人，擴大

33 清·鄂爾泰等，《清世宗實錄》卷 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收於《清實錄》冊 7，頁 355-359。根據石橋崇雄的研究，漢文中的「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在滿文版中為「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石橋崇雄，〈滿文『han i araha gucu hoki i leolen』（御製朋黨論）〉，《國史館學刊》4（東京，1996），頁 1-32。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譯編說明〉，頁 1-9。

35 清·馬齊等，《清聖祖實錄》卷 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甲午，收於《清實錄》冊 6，頁 646。

到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道員和部分知府，允許他們密摺奏事，直達御前。雍正帝在親自批答之後發回本人，該人在奉讀之後須將批有皇帝諭旨的原件交回，不得私自收藏，即便諭旨僅僅是「閱」、「知道了」，也嚴禁隨意鈔存。宮崎市定認為，伴隨著奏摺政治的出現，雍正時期還出現了兩起對清朝政治統治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大事，其一是軍機處的設立，其二是幕友政治的流行。

關於前者，宮崎市定認為，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開始令怡親王（1686-1730）和張廷玉（1672-1755）、蔣廷錫（1669-1732）三人「密辦軍需事務」，主要負責處理西北軍務——與準噶爾部的戰爭。雍正十年，正式設立「辦理軍機處」。<sup>36</sup>與通常只由皇帝一人親閱批答的奏摺不同，這些涉及軍國大事的奏摺會交軍機大臣先行商議，待其提出處理意見後呈交皇帝進行裁可，由此開啟了軍機大臣的「票擬」。宮崎市定關注的雍正七年確實是奏摺政治的一個重要的轉換節點。雍正帝在為頒行硃批奏摺撰寫的序言中曾經這樣說到：

雍正六年（1728）以前，晝則延接廷臣，引見官弁，傍晚觀覽本章，燈下批閱奏摺，每至二鼓三鼓，不覺稍倦，寔六載如一日，此左右近侍及內直大臣所備知者。近年以來，天下庶政，漸次就理，下情稍覺洞達，臣工之奏摺較前減少，而朕躬精力亦不如前，批答之事，始從簡便。此實情實事，可舉以告天下者。<sup>37</sup>

雍正六年以後，「臣工之奏摺」是否較此前有所減少尚不得而知，但是雍正在發佈前引上諭時已經年過五旬，他本人亦坦承「朕躬精力亦不如前」，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奏摺政治的運作，就只能藉助近臣之手。

關於後者，宮崎市定專門撰寫了〈清朝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一文，<sup>38</sup>他認為，由於雍正帝准許非機密奏摺可

36 郭成康認為，軍機處的設置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他認為趙翼（1727-1814）的「雍正年間」說較為穩當。郭成康，〈雍正密諭淺析——兼及軍機處設立的時間〉，《清史研究》1998：1（北京），頁 1-13。並請參看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頁 132-163。

37 清世宗，《硃批諭旨》（清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三年〔1738〕內府木活字朱墨套印本）冊 1，上諭，頁 2a-b。

38 宮崎市定，〈清朝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16：4（京都，1958），頁 347-374。現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以請人代筆，於是為「士大夫式的胥吏」——幕友的活躍提供了空間，並出現了專門的知識領域——幕學。幕友政治起於雍正年間，在乾隆年間達到頂點，以後逐漸墮落。

從宮崎市定關於雍正帝及雍正時代相關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基點是對中國宋代以後政治制度發展變化的歷史，以及西歐前近代以來政治制度發展變化的歷史的思考和分析。在此基礎上，宮崎市定認為，雍正帝的奏摺政治是促使中國近世專制政治制度更趨完善的一種外力，也確實為康熙年間之後的中國內政帶來了某些變革，鞏固了清朝統治制度的根基。同時，他也注意到，雍正年間在奏摺政治方面的變革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不可持續的，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者的個人因素。因為，專制制度的變化演進除了制度本身的問題之外，運用該制度進行統治的君主個人的年齡閱歷等因素也是不能忽視的。<sup>39</sup>宮崎市定指出，45歲即位的雍正帝正值大幹一番事業的年齡，加之在「冷宮中喫冷飯」期間積累的政治經驗和鬱積的改變現狀的強烈意願，所以才能在短時期內以雷霆萬鈞之勢做出如此事業。但另一方面，從雍正帝決意將硃批諭旨編輯出版一事本身也可以看出，他自身應該完全洞悉在官僚內部對包括奏摺政治運用在內的諸項施策並非心悅誠服。情況果然不出所料，待到未經政治風雨、弱冠25歲便安穩地繼承了江山大業的乾隆帝就已經沒有了乃父對全國的官僚一一做出具體指示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統治決策的中心自然會逐漸轉移到軍機處，奏摺政治也必然會變質。

關於奏摺政治的變質，宮崎市定還舉出了同治年間（1862-1875）饒旬宣編纂的《奏摺譜》為例。對比該書記載的內容與雍正帝本人對奏摺的要求可以看出，雍正帝對奏摺的行款格式沒有特殊的規定，甚至提醒上奏請安摺時不必使用綾絹，只要求如實上奏。如在陝西寧夏道道員鄂昌（1691-1755）為允許使用奏摺的謝恩摺上，雍正帝批到：

於汝責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執公執私，

---

173-205。

39 宮崎市定，〈雍正硃批諭旨解題——その史料の價值——〉，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頁168。

屬員某優某劣，營伍是否整飭，雨暘是否時若，百姓之生計若何，風俗之淳澆奚似，即鄰境遠省以及都門內外，凡有駭人聽聞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見，悉可以風聞入告也。<sup>40</sup>

對於未能及時陳奏的官員，雍正帝會發出斥責，如「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歲豐歉，何故未見陳奏一字」，「既差人來奏謝，為何不將兩水米價情形乘便奏聞」等等。<sup>41</sup>相比之下，《奏摺譜》不僅斤斤計較於奏摺的行款格式，還注意提醒用詞的禁忌，以及請安摺的摺面底板要使用「雲龍黃綾」，摺身要用「黃粉箴」等等。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奏摺制度在雍正年間以後作為國家處理政務的必要文書這一點雖然被堅持下來，但就其運用的實態來說是隨著時代的推移日趨內卷，逐漸地變為一種類似於追求「辦公室美學」的自我目的化。我們從雍正年間之後清代官僚政治發展變化的歷史也可以看出，儘管雍正帝付出了「每至二鼓三鼓」批閱奏摺，「每摺或手批數十言，或數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的極大努力，但他深惡痛絕的朋黨政治始終未能根絕，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他的兩位股肱之臣——鄂爾泰和張廷玉，「以在政地久，兩家子弟賓客，漸且競權勢、角門戶」，公然結黨傾軋，源自科舉考試的「座師」、「房師」與「門生」的關係始終牢不可破。<sup>42</sup>伴隨著外補制度的確立，基於任官之地的各類「同官錄」的公開編輯發行，實際上等於堂而皇之地形成一個個以任地省分為中心的朋黨團體。<sup>43</sup>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雍正帝的諸項施策只不過是獨裁君主在源自宋代以來、和官僚之間持續不斷的暗鬥中取得了暫時性的「勝利」，但終究未能打破官僚制度對獨裁君主實施其統治的制約，反而凸顯了傳統中國政治體制、尤其是官僚制度特有的強韌性。

總而言之，雍正帝在短短的十三年間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尤其著名的就是繼承了乃父康熙帝的密摺制度，在日常統治中有效地利用

40 《硃批諭旨》冊 92，〈鄂昌〉，頁 2a。

41 《硃批諭旨》冊 75，〈柏之番〉，頁 8a、22b。

42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88，〈鄂爾泰張廷玉傳論〉，頁 10241-10242。

43 近藤秀樹，〈清代之銓選——外補制的成立——〉，《東洋史研究》17：2（京都，1958），頁 34-55；伍躍，〈清代中国的「同官錄」について〉，《大阪經濟法科大学法学論集》73（大阪，2014），頁 95-123。

奏摺實現下情上達和上意下達，從而促成一個以皇帝為頂點，經過督撫藩臬直至方面大員<sup>44</sup>的統治迴路在一定時期內的暢順。所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康熙帝晚年國家治理中的若干弊病，為乾隆帝的登場準備了相對良好的政治條件。為了說明雍正時代的特點，宮崎市定特意引用了章學誠（1738-1801）的一段著名評論：

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為盛節。<sup>45</sup>

宮崎市定認為，這不是御用學者的阿諛奉承，而是對雍正帝「最大最美」的讚詞。我個人認為，這是作為著名史家的章學誠對雍正帝及其時代的冷靜而透徹的洞察。我們透過這段讚詞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政治在章學誠眼中屬於「千載一時」之政，其「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的舉措確實帶來了其他時代所無的某些氣象。但既然是「千載一時」，則必然擺脫不了人在政存，人去政亡的命運。宮崎市定將《雍正帝》的最後一章命名為「獨裁政治的界限」的理由或許就在這裡。

囿於篇幅和本人學識，本文僅介紹了雍正硃批論旨研究班以及宮崎市定的相關研究。最後想補充兩點。第一，隨著大量滿漢文獻檔案的公布，對清代奏摺制度和奏摺政治發展變化的研究已經十分深入。<sup>46</sup>僅以雍正朝為例，除了雍正帝本人的親手書寫「親筆硃諭」之外，還發現了「恭摺硃書密諭」和「親信廷臣代書密諭」的存在。<sup>47</sup>後兩者提醒我們要注意雍正帝在處理臣下奏摺時是有一定區分的，既有嚴格保密者，也有在一定範圍之內經贊襄政務的王大臣等協商後交「乾綱獨斷」者，後者直接發展為軍機處的「票擬」制度。第二，宮崎市定《雍正帝》一書

44 內藤乾吉，《六部成語註解》（京都，內藤乾吉，1940），頁19。

45 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5，〈內篇五·古文十弊〉，頁587。

46 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47 郭成康，〈雍正密諭淺析〉。並請參看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頁132-163。

體現的史觀中蘊含著強烈的時代烙印，尤其是近代日本對西歐文化的崇拜，這一點也突出地表現在對康熙帝的評價之中。如「公平而視，西洋文化要優秀得多。……康熙帝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都更被西洋文化的魅力所吸引」。<sup>48</sup>對康熙帝的這種評價是片面的，至少完全低估了康熙帝作為不世出的領袖人物所具有的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手腕，以及特殊的人生閱歷。<sup>49</sup>至於寫作於 1940 年代晚期的該書透露出的對現實問題的關心，相信讀者們會有感知，無須筆者贅言也。

---

48 宮崎市定著，孫曉瑩譯，《雍正帝》，頁 145-146。

49 即以康熙帝對西洋的態度而言，在關注數學、物理學等的同時，並沒有忘記最為國家統治者的職責。如晚年的康熙帝曾告誡大臣，「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至大，小者猶不可忽，大者益宜留心。……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清·馬齊等，《清聖祖實錄》卷 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收於《清實錄》冊 6，頁 649-650。在宮崎市定閱讀過的《十一朝東華錄》卷 98 中就收錄有康熙帝的這一論旨。

濱田正美	利光有紀	松浦章	岡野昌子	西嶋尚泚	坂出伸祥	終眞幸夫	神戶輝夫	藤田敬一	難波新治	楊波啓樵	吉川忠夫	山口延子	小野信爾	波多野善大	岡本午一	安部健夫
井上進	萩原淳平	森紀子	河政植	山本徳子	黄野漢超	朝野浩之	白西紳一郎	衣川合強	楊合義	横山裕男	礪波護	梅原郁	勝藤猛	里井彦七郎	宮川尚志	宮崎市定
小野和子	山根幸夫	北村敬直	阪倉篤秀	足立啓二	Philip Kuhn	愛岩元	重松伸司	西里喜行	藤善眞澄	谷口規矩雄	若松寛	永田英正	河内良弘	池田誠	日比野丈夫	小野川秀美
竺沙雅章	間野潛龍	杉山正明	秋山元秀	Peter Golas	西村元照	島居一康	金城正篤	近藤治也	勝村哲也	中山齊	森正夫	近藤秀樹	岩見宏	島田虔次	佐伯富	
夫馬進	大澤顯浩	檀上寛	井上裕正	島田恵子	長島弘	鈴木敏昭	上田早苗	佐竹靖彦	大谷敏夫	稻葉一郎	小野寺郁夫	寺田隆信	谷光隆	佐藤圭四郎	山本隆義	
福本雅一	村尾進	西村かずよ	岩井茂樹	清水和美	鈴木富子	高畑紘志	植松正	杉村邦彦	小玉新次郎	狭間直樹	堀川哲男	恵谷俊之	狩野直禎	塚本俊孝	荒木敏一	

附圖 1 雍正硃批論旨索引從事者姓名

資料來源：《雍正時代の研究》，頁835。

## 徵引文獻

### 一、文獻史料

- 清·馬齊等，《清聖祖實錄》，收於《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
- 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 清·鄂爾泰等，《清世宗實錄》，收於《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
- 清·藍鼎元著，宮崎市定譯，《鹿洲公案——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記録》，東京，平凡社，1967。
- 清世宗，《硃批論旨》，清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三年（1738）內府木活字朱墨套印本。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佐伯富，〈はしがき——雍正硃批論旨研究班の思い出——〉，收於東洋史研究會編，《雍正時代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頁 i-iii。
- 宮崎市定，〈人文科學研究所雍正硃批論旨索引緣起〉，收於東洋史研究會編，《雍正時代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頁 833-834。
-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二、近人研究

#### （一）中文

- 甘懷真，〈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收於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533-546。
- 伍躍，〈日本的雍正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7，北京，頁 26-30。
- 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4，北京，頁 4-28。
- 宮崎市定著，孫曉瑩譯，《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北京，社會科學

- 文獻出版社，2016。
- 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 陳正國，〈從專制到東方專制——十八世紀英國殖民進程與東方專制論的源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4，臺北，2017，頁 917-995。
- 郭成康，〈雍正密諭淺析——兼及軍機處設立的時間〉，《清史研究》1998：1，北京，頁 1-13。
-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
- 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劉法曾，《清史纂要》，上海，中華書局，1914。
- 蕭一山，《清代通史》冊 1，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
-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清國行政法汎論》，東京，金港堂書籍，1909。

## （二）日文

- 井上文則，《天を相手にする——評伝 宮崎市定》，東京，國書刊行會，2018。
- 內藤乾吉，《六部成語註解》，京都，內藤乾吉，1940。
- 石橋崇雄，〈滿文『han i araha gucu hoki i leolen』（御製朋党論）〉，《国士館史学》4，東京，1996，頁 1-32。
- 伍躍，〈清代中国の「同官録」について〉，《大阪経済法科大学法学論集》73，大阪，2014，頁 95-123。
- 佐伯富、島田虔次、岩見宏、礪波護編，《宮崎市定全集》第 1-24 卷、別卷，東京，岩波書店，1991-1994。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所 50 年》，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9。
- 京都大學百二十五年史編集委員會，《京都大學百二十五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23。
-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
- 東洋史研究會編，《雍正時代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
- 近藤秀樹，〈清代の銓選——外補制の成立——〉，《東洋史研究》17：2，京都，1958，頁 34-55。
- 宮崎市定，〈支那側史料より見たる英仏聯合軍の北京侵入事件——特に主戦論と平和論〉，《東亞研究所報》24，東京，1943，頁 40-72；收於佐

- 伯富、島田虔次、岩見宏、礪波護編，《宮崎市定全集》第 16 卷，頁 117-147。
- 宮崎市定，《科举》，東京，秋田屋，1946。
- 宮崎市定，〈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東方史論叢》1，丹波市町，1947，頁 1-56；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282-337。
- 宮崎市定，《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東京，岩波書店，1950；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3-133。
- 宮崎市定，〈雍正硃批論旨解題——その史料的價值——〉，《東洋史研究》15：4，京都，1957，頁 1-32；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137-172。
- 宮崎市定，〈清朝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16：4，京都，1958，頁 347-374；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173-205。
- 宮崎市定，〈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實狀——硃批論旨と鹿洲公案——〉，《東洋史研究》18：3，京都，1959，頁 241-266；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頁 206-235。
- 宮崎市定，《科举——中国の試験地獄》，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1984；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5 卷，頁 1-252。
- 宮崎市定，〈雍正時代の研究 解説〉，收於《雍正時代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6，頁 829-832。
- 宮崎市定，《科举史》，東京，平凡社，1987；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5 卷，頁 255-444。
- 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清國行政法》第一卷汎論（上、下卷），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1914。

## Miyazaki Ichisada and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Yongzheng Emperor's Vermilion Rescripts

WU Yu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trajectory of postwar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focus on the Yongzheng 雍正 Emperor (r. 1722-1735), highlighting in particula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Yongzheng Emperor's Vermilion Rescripts at Kyoto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From 1949 to 1971, this group operated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be Takeo 安部健夫 (1903-1959), Miyazaki Ichisada 宮崎市定 (1901-1995), and Onogawa Hidemi 小野川秀美 (1909-1980), attracting nearly one hundred participants. The group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vermilion rescripts, undertaking research on such themes as the memorial system, factionalism, fiscal administration,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Its findings were published in special issues of the *Toyōshi kenkyū* 東洋史研究 (*Studies on Oriental History*) and later compiled into the volume *Yōsei jidai no kenkyū* 雍正時代の研究 (*Studies on the Yongzheng Era*). This kind of long-term collective reading and research effort was rare in the academic world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Qing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history.

The group not only revealed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the vermilion rescripts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ir function in the workings of autocratic politics. During his thirteen-year reign, the Yongzheng Emperor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reforms to discipline officials and strengthen central authority, ye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se reforms was ultimately limited by both personal energy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verall, the efforts of

---

\* Professor, Faculty of Law, Osak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Miyazaki Ichisada and the research group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Yongzheng studies and reflected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of postwar Japanese scholarship.

Keywords: autocratic politics, memorial system, Miyazaki Ichisada, vermilion rescripts, Yongzheng Emperor